

从学术资本到学术资本主义:以美国高校为中心

胡钦晓

[摘 要] 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学术资本和学术资本主义都已经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趋利取向是两者最为重要的行动边界。美国高校不但学术资本最为丰厚,而且也是学术资本主义理论产生的源发地以及学术资本主义现象的普遍流行之地。政治、市场、文化等外部力量的裹挟以及高校、管理者、教师等内部主体的跟进,是美国高校从学术资本到学术资本主义的演进动因。大学理念的商业性、大学职能的商品化和大学管理的公司化,无不表现出美国高校从学术价值到商业价值的趋利取向,学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已经向世界拓展。规避学术资本主义,既需要学术资本回归学术,也需要学术资本超越主义,更需要国家、高校和教师的责任担当。

[关键词] 学术资本;学术资本主义;趋利取向;美国高校

一、前言:概念区分与对象选择

学术资本作为高校多样资本中的最为基础和重要的资本形式,在大学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当学术资本演变为学术资本化或学术资本主义,也必将大学带入物欲横流之地。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学术资本和学术资本主义都已经引起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密切关注。

(一) 概念区分:学术资本与学术资本主义

在澄清学术资本概念时,我们曾对“学术资本”“学术资本化”和“学术资本主义”进行了区分。^①此处,尚需要做进一步厘定。结合前期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趋利取向是学术资本与学术资本主义最为重要的行动边界。这里的趋利取向绝非仅仅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还包括对政治利益、社会等级、社会声誉等其他利益的追逐和摄取,同时,也包括为降低成本而不顾质量的诸多行为。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区分:

1. 在大学发展中,是以学术发展,还是以逐利为宗旨。大学是从事高深学问的机构,应以学术发展为宗旨,始终坚持通过学术发挥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的职能。以逐利为鹄的,在学术资

胡钦晓,教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曲阜 273165)。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课题“学术资本与大学发展”(BIA140104)的研究成果。

^①胡钦晓:《何谓学术资本:一个多视角的分析》,《教育研究》2017 年第 3 期。

本主义笼罩下的教育机构充其量只能被视作“学店”而非大学。2. 在学术资本转换中,是否有利于学术创新。学术创新是大学得以生存发展的根本保障。如果大学不再具有创新性,学术不再具有稀缺性,那么大学衰败将不可避免。3. 在学术资本转换中,是真正通过学术获取合法利益,还是假借学术进行纯商业行为。大学不是物质生产和销售部门,但是大学生存发展不能缺失经济支持。通过学术发展获得外界支持和认可,恰恰是大学长期发展的基本方略。但是,大学不是商场,过度商业行为最终伤害的是大学自身。4. 在学术资本转换中,是否以互惠、利他主义抑或是公共福祉为行动指导。现代大学从产生至今,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与其从事高深知识的公共福祉性密切相关。无论是公立大学,抑或是私立大学,在学术资本转换中都不能够丢失利他主义和公共福祉。5. 在学术资本转换中,是否注重组织和个人的学术声誉。学术声誉本身是学术资本的组成部分,相对学术成就,一般来说学术声誉的获得更为漫长。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在学术成果转换中,如果能够考虑一下是否会对其学术声誉造成损害,那么一般就不会陷入学术资本主义的泥潭。

(二) 研究对象:因何以美国高校为中心

如果从 1793 年巴黎大学被政府取缔算起,世界大学走到今天,已经有超过两个世纪的跌宕历程。粗略划分这两个世纪,可以说,德国大学和美国大学各领风骚一百年。19 世纪初期的德国大学在内忧外困中,凭借创新性的学术资本发展,使德国从欧洲高等教育后发国家,一跃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俾斯麦之后,德国大学从巅峰开始走向滑落,而此刻正是以赠地学院运动为标志的美国大学群落崛起之时。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伴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传统研究型大学的现代化改造,一个百舸争流的美国大学群落已经蔚为壮观。历史发展总是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如果从芝加哥大学(1890 年)、斯坦福大学(1891 年)的创办算起,美国大学占领世界高等教育之巅也已经长达一个世纪。在这一个世纪里,与德国大学在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从走向滑落一样,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大学也遭遇自产生以来的最大冲击——学术资本主义。尽管我们尚不能断定学术资本主义是否会将美国大学引入穷途,但是,从中世纪大学和德国大学走向没落的历史演进中不难看出,学术资本主义乃学术资本发展之恶,学术资本主义乃大学发展之恶是毋庸置疑的。

这里之所以选择以美国高校为中心,主要基于:第一,从当今世界大学学术资本的存量来看,选择美国高校更具有代表性。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高等教育虽遭遇到学术资本主义冲击,但从目前来看,美国大学群落仍然占据着世界高等教育之巅。尽管学术资本很难精确度量,但是从大学整体发展来看,美国高校的学术资本仍然是世界上最为丰厚的。第二,从学术资本主义理论来看,美国学术界是该理论产生的温床。希拉·斯劳特 (Sheila Slaughter)、拉里·莱斯利 (Larry L. Leslie) 是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最先提出者。他们将学术资本主义界定为,院校及其教师为确保外部资金的市场活动或具有市场特点的活动。^① 尽管他们在使用学术资本主义概念时,有意规避了企业阶级性质“出卖灵魂”的强烈意味(而这恰恰是学术资本主义最为本质的一个特征),但是作为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最先倡导者,其研究为该理论的进一步辨明提供了基础性框架。第三,从学术资本主义的产生来看,美国高校不但是先发地,也是普遍流行之地。所谓学术资本主义理论,就是对高校融入新经济过程的解释。^② 换言之,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产生,来自于美国高校发展的实践。无论是相对高等教育先发的欧洲国家来说,还是相对高等教育后发国家而言,美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商业化,不但起步早而且影响也更为深远。

^①[美]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学术资本主义》,梁晓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8 页。

^②Slaughter, S. & G. Rhoades, *Academic Capitalism and the New Economy: Markets, State, and Higher Educ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

二、动因：外部裹挟与内部跟进

美国高等教育商业化的拐点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尽管在此之前高校也存在诸多商业性行为,但一般来说是局部的、边缘的。70 年代之后,这种商业性行为演变为一种全局性行为,并直达学术组织的核心。^① 从“商业性”到“商业化”,一定意义上也是从学术资本到学术资本主义的演变。这种演变的动因是多元的,既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力量的裹挟,也有大学组织、管理者和教师群体内部的跟进。

(一) 政治、市场、文化等外部力量的裹挟

1862 年《莫里尔法案》的颁布,标志着美国政府通过经济支持,开始大规模介入高校发展。伴随政府的强力支持,尤其是足额的公共拨款,美国政府与大学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和谐期。但是,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尤其是里根就任总统后,美国政府对大学的政治、经济、文化支持力度和方略均发生了质的变化。

1. 政治力量的推动

(1) 政府对知识价值和高等教育的态度发生转变

里根经济政策(Reaganomics)通常意味着国家福利减少,政府职能简化,鼓励公共部门私有化和商业化,利用公共部门潜在的利润要素生产财富。里根经济政策为公共和私人创造财富搭建了桥梁,并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重要影响。联邦政府通过立法改变了大学知识价值的传统立场。在传统上,知识的经济价值是大学对知识追求的副产品,而现在,知识则成为大学赢得外部资金的重要动力。在这种知识价值导引下,联邦政府对大学应用研究资金的份额不断增加,而对社会科学和艺术基金的份额不断削减。^② 最终,那些可带动经济发展的技术知识,逐渐取代了传统上以探寻真理为目标的“纯粹知识”,知识的价值在国家层面开始以金钱而非文化来衡量,这为学术资本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外部环境。

莱文(Arthur Levine)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支持不断降低,主要基于以下原因:其一,这时候政府经济也遭遇困境,没有更多的资金支持高校;其二,在政府看来,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应该让位于监狱、医疗卫生等其他公共部门,即使在教育领域,中小学也优于大学,孩子也优于成人;第三,在政府看来,高等教育已经发展为一个成熟的产业,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60%,政府没有兴趣将其提高到 70% 或者 80%。^③ 约翰斯通(D. Bruce Johnstone)也认为,在日益稀缺的公共资源争夺中,高等教育的优先位置在美国不断下降。在对公共资源需求的排名中,高等教育尽管重要,但却居于相对靠后(至多是“中等”)的地位。^④ 总之,美国往日高等教育优先发展的方略已经不再。

(2) 政府对科研管理和专利拥有的方略发生转变

联邦资助大学科研是二战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重要经济来源。根据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100 所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会得到超过联邦研发经费总数的 80%。传统上,这些经费是通过专业领域

^①[美]德瑞克·伯克:《大学何价:高等教育商业化?》,杨振富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社,2004 年,第 24—25 页。

^②Rhoades, G. & S. Slaughter, “Academic capitalism, managed professionals, and supply-side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Text*, Vol. 51, No. 2, 1997, pp. 24—25.

^③Levine, A., “Higher Education Becomes a Mature Industry”, *About Campus*, Vol. 2, No. 3, 1997, pp. 31—32.

^④[美]布鲁斯·约翰斯通:《高等教育财政:问题与出路》,沈红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153—155 页。

的专家评估,以竞争的方式来分配。这种做法遵守了学术能力优先的原则,强调学术资本在大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980年,政府开始转变资助政策,无需正式竞争和评估,以大约1000万美元的经费指定资助。这种不经同行专家评估就指定经费的做法被强烈批评为“政治分肥学”(pork barrel science)。^①质言之,“政治分肥学”完全是借用公平之名,对公共经费进行分赃,不但是对学术和创新能力的无视,也为政治介入学术、政治代替学术、滋生学术腐败等种下诸多隐患。“政治分肥学”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大学开始增加对政治权力的游说,学术向权贵低头;科研经费的平均主义分配,最终使学术向平庸低头。

1980年美国通过《拜杜法案》(Bayh-Dole Act),赋予大学享有联邦政府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而在此之前这些专利只能归由政府享有。《拜杜法案》激发了大学发明及转化科研专利的积极性,使大学更容易用公费补助的研究成果取得商业利益。在专利政策鼓动下,不但自然科学的专家忙着申请专利,担任公司顾问,参与股东分红,甚至是直接创办公司,而且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专家,也参与到私人企业、顾问公司,他们的专业建议均可待价而沽。短短几十年内,美国大学进入了一个充满商机,知识可以变黄金的全新世界。^②《拜杜法案》打破了学术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利益“火墙”(fire wall)。公司开始吸引大学内部的智力资源,而大学内部教员、系科、管理者之间的松散联系,为一部分人员首先进入市场提供了先机。^③毫无疑问,《拜杜法案》在激发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同时,也为学术资本主义的滋生和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 政府对学生资助与质量管理的模式发生转变

在政府拨款减少的岁月里,公立大学被迫削减项目,提高生产率,但这远远不能弥补政府补助的缺失。联邦政府资助学生的方略,已经从无偿资助演化为贷款,然后又变成了税利。这种资助方式的转变也意味着更深层次的理念转变,亦即,从把高等教育看作是一个有益于全社会的公共产品,变为把它看作是一个使个体受益的商品。^④毕业生税更是将学生成本分担,由家长转移到学生毕业后偿还。^⑤毕业税的推行,让接受高等教育完全成为一种私人商品。谁受益谁还账,使知识中的公共价值被遮蔽,知识中的交换价值被过分张扬,为学术资本主义中教学商品化提供了合法依据。

在美国,政治介入学术的努力从未间断,但总体而言,大学质量管理表现出高度自治。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质量管理模式受到强烈冲击。1987年,国会设立旨在“促进美国商业的竞争力”的国家质量奖,2002年,由总统乔治·布什和商务部长唐·埃文斯(Don Evans)颁奖的组织是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个区域分校和设在田纳西金丝伯特与圣安东尼奥的两个学校管区(Pal's Sudden Service, Clarke American Cheeks)。在政府看来,所有的质量都是相似的,一家快餐连锁店,一个私有化的支票生产公司,一个天主教学校管区,可以和一所大学相提并论。^⑥政府对大学管理模式的改变,促使各大学纷纷向商业化靠拢。

2. 市场力量的催化

二战以后,联邦政府开始代替私人赞助者的角色,承担起大学学术资助的更大份额,大学也惯性地认为,这种支持会增进知识的内在价值正当化。20世纪70年代,高等教育渴望联邦政府能够恢复

^①Altbach, P., R. Berdahl & P. Gumpert等:《21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杨耕等主审,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6—159页。

^②[美]德瑞克·伯克:《大学何价:高等教育商业化?》,第32—36页。

^③Slaughter, S. & G. Rhoades, *Academic Capitalism and the New Economy: Markets, State, and Higher Education*, p. 129.

^④[美]詹姆斯·杜德斯达等:《美国公立大学的未来》,刘济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4—65页。

^⑤[美]布鲁斯·约翰斯通:《高等教育财政:问题与出路》,第294页。

^⑥[美]埃里克·古尔德:《公司文化中的大学》,吕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以前的慷慨资助,但是大学寻求资源不得不由政府转向市场。^① 这在公立大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90年代,各州不顾大学注册人数迅速增加的事实,拨给高等教育的经费连续降低。后来,州政府经费尽管有所恢复,但如果把通货膨胀计算在内,1995年度的拨款总额,其实比1990年还降低了8%,且不论学生注册人数提高了6%。^② 与大学招生人数持续增加相悖的,是政府实际拨款不断减少。市场化运作使大学与公益性渐行渐远,市场力量成为促进学术资本主义的催化剂。

学术资本主义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私立营利性部门的出现并快速繁殖。过去,私营部门进入高等教育的主要障碍,一个是巨大的投资成本,另一个是投资大学不赚钱。伴随技术和社会需求不断变化,私营竞争者可以低成本、高收入地进入高等教育市场。与传统高校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投入上不同,新的营利性机构把重点放在产出上。^③ 仿效企业运作模式,教育中开始出现上市公司。1991年,在美国获得认证,具有学位授予权的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中,只有一家上市公司。8年以后,这样的教育公司增加到40家。奎斯特教育公司专门收购各种大学,它在11个州拥有30个分校,除一所分校外,其他29所都是通过收购而来。美国高等教育统计中心重新定义了高等教育,将其范畴扩展为包括符合联邦财政资助的营利性私立学校。在此之前,美国教育部把高等教育机构定义为得到教育部承认的认证机构认证的学校。这一政策的改变,仅在1996年,教育部管辖的高校数目就提高了7.5%,其中营利性大学为669所。^④ 教育私立营利性机构和教育上市公司形成了完全以趋利为目的的教育组织,颠覆了近千年以来宗教、政府、民间团体对教育公益性的定义。

3. 文化力量的浸染

学术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内产生的,有悖于学术发展的文化现象,就其产生的文化因素来看,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发挥着重要影响。

第一,新自由主义导致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传统的社会契约相背离。传统上,高等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契约是建立在公共福祉之上的共同体哲学。新自由主义哲学则坚信,私人的必然是好的,而公共的必然是坏的。经济理性取代了所有其他形式的逻辑,人们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可以采用任何形式。私有化、商业化和公司化是新自由主义的三个基本趋势和特征,由此孕育并催生出了高等教育的产业模式。^⑤

第二,新自由主义导致消费主义在高等教育领域盛行。在雷丁斯(Bill Readings)看来,消费主义意味着,没有哪种福利能够逃脱成本——收益的分析。^⑥ 他将消费主义视为对北美大学教育传统最为紧迫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正是源自于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和商业化趋势。消费主义文化将学生由传统的学习者改变为消费者,为私人购买高等教育提供了文化场景,也为高等教育机构不断提升学费提供了交易理由;消费主义文化打破了传统上的全日制教师身份,终身教职员在消费主义文化面前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大学为节约培养成本,更是聘用大量非全日制人员;消费主义文化将传统上的公益性大学重新进行了定义,营利性教育组织开始突破传统壁垒,登上学术的殿堂。

第三,新自由主义导致产业文化逐渐压制学术文化。在本质上,产业文化和学术文化是不同的。从目的来看,产业利用研究的目的是从一些技术优势中获得经济回报,而学术的使命是推进并传播知识;从表现形式来看,产业文化的优势在于专有的知识,体现为商业机密、而学术文化是通过公开

^①[美]罗杰·盖格:《大学与市场的悖论》,郭建如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②Altbach, P., R. Berdahl & P. Gumpert等:《21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第112页。

^③[美]詹姆斯·杜德斯达等:《美国公立大学的未来》,第66—68页。

^④[美]理查德·鲁克:《高等教育公司:营利性大学的崛起》,于培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7—60页。

^⑤Kezar, A., "Obtaining integrity?: Reviewing and examining the charter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ety", *The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Vol. 27, No. 4, 2004, pp. 435—437.

^⑥[加拿大]比尔·雷丁斯:《废墟中的大学》,郭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出版或者发表便于同行共享；从知识性质来看，产业文化旨在将专有知识转换成可售产品，而学术文化则倾向于理论贡献越多，承认就越大。^① 在新自由主义驱使下，产业文化中的经济回报，战胜了学术文化中的推进并传播知识；产业文化中的商业机密，战胜了学术文化中的公开发表；产业文化中的应用研究，逐渐对学术文化中的理论研究形成了压倒性态势。

第四，新自由主义促进科学的价值和判断标准发生改变。在美国的文化语境中，关于科学的价值和标准判断有着不同的路线。第一条称之为莫顿路线，将科学视为开放的、共有的、普遍的、无私的及适度怀疑的；第二条路线强调科学具有服务于军事、工业等商业价值；第三条路线强调科学的去理想化和实利主义；第四条路线认为科学并非“无关价值”(value-free)，而是同时拥有学术和市场价值。第五种路线强调科学为公共福祉和知识共享服务。^② 在新自由主义冲击下，科学价值和判断标准的莫顿路线逐渐被抛弃，一种融合第二、第三和第四条路线的，强调商业价值、去理想化、融入新经济的复合科学价值观逐渐在高校内外形成，并影响着大学学术产出的导向。

第五，新自由主义影响到外部力量的评估和问责机制。传统上，因为高校的主要资助来自于政府或慈善，所以公共资助下的自我管理是大学发展的主流模式。在 20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包括大学在内的许多专业机构都面临着资助挑战。政府更多利用绩效指标，将非学术性评估标准引入大学。资助机构强调从研究中获得回报，将事前及事后评价系统与资助紧密捆绑在一起。^③ 与之相应的是，“企业化大学”“公司大学”“知识工厂”等描述大学的词汇，纷至沓来。大学学术实践的价值，越来越依靠转化成现金或者商品的能力，而不是诸如审美、闲暇乐趣等方面，最终连同其他非经济价值一并丢失。^④

（二）高校、管理者、教师等内部主体的跟进

高校、管理者和教师是学术资本和学术资本主义的行动主体。从主客观关系来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客观环境，必然会影响行动者的主观意识；从唯物辩证法来看，政治、市场和文化等因素是学术资本主义形成的外因，高校、管理者和教师是学术资本主义形成的内因，没有行动主体的内因，学术资本主义也难以产生。有着强烈实用主义传统的美国大学，在外部力量推动下，或主动或被动，逐渐群体跟进学术资本主义。

1. 高校的群体跟进

伴随知识经济的涌入，高校外部世界早已演变为以金养金的商业市场。大学与外面商场之间的鸿沟日渐缩小。只要大学学术至上的护城河稍有破漏，学坛沦为商场的决堤之日应该是可以预见的。^⑤ 20 世纪 80 年代，众多营利性大学在北美次第兴起，90 年代以后，跨越国界的私立高等教育也相继产生。一个国家的大学可能在另一个国家建立分校，授权使用该大学的课程和实践项目，这种情形被称为高等教育的“麦当劳化”。^⑥ 在高等教育私营化的潮流中，公立大学也开始毫不掩饰对金钱的偏好，在牟利活动中尽显所能。科研水平不高的社区学院，由于不具备争取可以营利的高水平科研实力，就通过聘请大量兼职教师来降低培养成本，并通过不断扩大规模赚取更多学费，将决定组

^①[美] 罗杰 · 盖格 :《大学与市场的悖论》，第 186—187 页。

^②Slaughter, S. & G. Rhoades, *Academic Capitalism and the New Economy: Markets, State, and Higher Education*, pp. 75—79.

^③Henkel, M., “Current Science Polic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Form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Academic Identity”,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Vol. 17, No. 2, 2004, pp. 167—182.

^④Nixon, J., “Education for the good society: The Integrity of academic practice”, *London Review of Education*, Vol. 2, No. 3, 2004, pp. 245—252.

^⑤曾志郎 :《大学之道：创新、创投、创业、创资？》，[美] 德瑞克 · 伯克 :《大学何价：高等教育商业化？》，杨振富译，第 11 页。

^⑥[美] 菲利普 · G. 阿尔特巴赫等 :《私立高等教育：全球革命》，胡建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前言第 3 页。

织生存的培养质量放在次要位置。一言以蔽之,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教学型大学,无论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无论是在国内办学还是到国外拓展,美国高校都在群体跟进学术资本主义。

2. 管理者的商人趋向

传统上,欧美大学校长是学术权威的化身,维护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是他们的重要职责。深受德国影响的美国大学,在院系层面上更加强调管理者的学术地位。大学董事会成员往往是那些与大学学术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利益相关者。在维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看来,这种现象早在20世纪初就发生了重大变化,董事会里出现了大量的世俗人员代替神职人员的现象。这些世俗人员是商人和政客,最终,大学政策事务上的支配权落入商人手中。^① 董事会在遴选大学校长时,开始更加看重他们管理大型企业的能力。1997年,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系统选任新校长时,认为“具有企业管理经验并不是一个附加条件,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② 企业型大学校长入职后,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筹资之上;研究型大学的领导人,在薪水之外,争相寻求兼职,以索取更多外快。布朗大学的校长成为高盛公司的董事,到她离职时,可以得到价值400万美元的股票;斯坦福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领导人,竞相进入Google董事会;华盛顿大学的校长兼职耐克公司董事,代价是由耐克公司向学校供应印有公司标志的运动衫。相对而言,美国私立营利性大学校长的商业性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在塞耶大学(Thayer University),校长的年度收入则高达4300万美元。^③ 在大学董事会的推动下,美国语境中的大学校长(president),已不再是学术坐席上前排就坐的领导者,而是善于经营钱财的董事长、总经理和总裁。

3. 教师的自我驱动

教师是大学学术资本主义形成的重要力量。在“非升即走”(up-or-out)和“不发表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的双重压力下,“重科研,轻教学”已经成为大学教师群体中挥之不去的顽疾。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培养人才是大学的原初职能,归根结底,教师重视科研而忽视教学,其背后是学术资本主义的趋利牵引。伴随大学与外部交往日趋频繁加深,大学教师的身份也日渐多样,教学科研甚至已经不再是其主要职业,“老板”逐渐成为学生对导师的称呼。在媒体的介入与炒作下,整日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学术明星与影视明星相差无几,他们利用个人或院校的学术声望去过度摄取经济利益,这在美国乃至世界大学中变得日益普遍。不惟学术至上的兼职教师,开始成为美国大学教员中的重要群体,因为兼职身份,他们不但缺少必要的学术忠诚,也缺少必要的院校忠诚,养家糊口成为他们工作的主要目的,朝来夕去成为他们的流动日常。在趋利取向浪潮的裹挟下,无论是全职教师还是兼职教师,学术资本主义心态已经在教师群体中悄然成风。树欲静而风不止,教师的学术资本主义由外部影响演变为内心驱使,由局部行为发展成群体行为,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学术志向逐渐淡去,纷纷跃入学术商业化的滚滚红尘之中。

三、表现:从学术价值到商业价值

20世纪70年代以后,学术资本主义表现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在大学理念层面,还是在大学职能及管理层面,都体现出明显的趋利性取向。

^①[美]索尔斯坦·凡勃伦:《学与商的博弈》,惠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页。

^②[美]亚瑟·科恩:《美国高等教育通史》,李子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2—343页。

^③[美]安德鲁·德尔班科:《大学过去,现在与未来:迷失的大学教育》,范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68页。

(一) 大学理念的商业性

1. 大学精神背离传统

新教移民创办高校,主要目的是让他们的信仰能够薪火传承,并培养有文化的子孙后代。大学创办者怀着无比虔诚,倾心投资于高等教育事业,哈佛、耶鲁、斯坦福等,无不与声名显赫的美国大学联系在一起。哈佛大学的“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耶鲁大学的“真理与光明”,斯坦福大学的“让自由之风劲吹”等,不但将大学推向知识高地,而且使大学成为社会的精神坐标。然而,这些反映大学特质的精神元素不断被商业浸染,真理、自由、光明等照亮人类前行的灯塔,在商业化的笼罩下日趋暗淡。私立营利性大学的兴起,更是与传统大学精神背道而驰。在阿尔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看来,这些营利性学校根本不能够被称之为大学:它们不像传统大学,是以赚取利润为首要目标;它们不是提供学科广泛的教育计划,而是集中于特定市场;它们不存在终身教职,教师均为兼职;它们不存在共同治理,权力完全集中在管理者手中;它们缺乏科研兴趣,因为科研影响营利使命。^① 私立营利性高校大量产生,不但是学术资本主义盛行的具体表现,也是大学精神萎靡的重要例证,当正能量的大学精神不能得到张扬,那些负能量的组织精神不但会侵蚀传统大学,而且也会催生出这样的变异性组织。

2. 学术自由遭遇冲击

自由一直是美国励志故事的主线,新教移民从欧洲远涉重洋主要是基于对自由的向往。当北美建立起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后,学术自由就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惯习,融入到美国大学的机体。伴随市场力量凌驾于学术专业,金钱以及效率必然会代替学术,从而主宰着大学行动。商业化助长了教职员的不良心态,仅把教学科研当作追求其他目的的手段,并不断损耗这学术中最为重要的个人自由。^② 当个人自由深陷商业化的漩涡,受到经济利益的纠缠,学术自由就会被蒙上阴影。许多大学鼓励教授与产业密切合作,教授通过技术入股的方式拥有高科技公司股票。当研究与商业利益直接勾连,研究人员常常会被要求在工作时保密。更糟糕的是,因为利益太大,有时会引诱研究者隐瞒结果,阻止发表某些可能不利公司的成果,甚至强迫篡改数据,这种直接侵犯学术自由的例子,在美国大学已不乏案例。^③ 与传统上教授积极争取学术自由不同,在商业化的冲击下,公司侵犯学术自由的行为,并未受到学者们强烈反对,物质化诱惑以及学者犬儒,已经成为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劲敌。

(二) 大学职能的商品化

1. 培养人才的商品化

(1) 高校招生争相竞价

20世纪70年代以后,联邦政府对学生学习资助的方式开始由学校转向学生。为了能够招到智力突出的学生,且不至于在竞争中损失更多经费,1989年,由包括“常春藤盟校”所有成员在内的24所私立大学组成了交叠集团(overlap group),宣称共同决定联盟中学生接受适当资助的额度。这一联盟因被认为违反了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而被司法部门叫停,但是联盟把美国高校群体带入了一个相互竞价的热潮。1992年,国会通过了一项反托拉斯豁免案,允许私立大学实行不事先考虑需求的招生政策。在国会颁布改善公立学校状况的法令后,28所全国排名最高的大学组成了568集团(568 Group)。正如古尔德所说,这些大学为争取生源所采用的方法,与其他商品及服务商争取顾

^①[美]菲利普·G.阿尔特巴赫:《冒牌大学的兴起》,菲利普·G.阿尔特巴赫等:《私立高等教育:全球革命》,第19—21页。

^②[美]德瑞克·伯克:《大学何价:高等教育商业化?》,第41—42页。

^③刘兆汉:《序:平衡利益与学》,[美]德瑞克·伯克:《大学何价:高等教育商业化?》,第5—6页。

客的方法没有什么两样。购买一个学生资源,无异于说服顾客买一辆汽车。^① 大学在招生中,已经把生源看作潜在的顾客,同时把学生看作一种未来的产品。

(2) 降低教学质量成本

美国私立营利性大学的代表凤凰城大学,拥有 100 多个校区和学习中心,集中于实用性较强而培养成本不高的一些学科。一门授予本科学生的课程通常为连续 5 周。传统上一个教师需要承担的工作,被分解到多个部门来完成,有一些工作则被完全剔除。凤凰城大学的教师聘期,按照 5 周为一个学期进行计算,不存在终身教职。大学坦言营利是自己的底线。^② 与私立营利性大学不同,非营利大学的教学管理呈现另外一种面相。2010 年 8 月,范恩(Paul Fain)在访问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时,认为在如诗如画的校园表面之下,大学内部暗流涌动。州政府预算削减已经严重威胁教学质量,本科生更多是去上课而不是进行实验,这主要是为了节约教学成本,州补助以及增加学费的收入被大学用在了非教学方面。^③

(3) 注重课程交易价值

高深知识既具有交易价值,也具有象征价值。通识文科课程主要强调象征意义,而非交易价值。由于具有象征意义价值的通识教育课程,在学生毕业后对就业的影响远远低于具有强烈交易价值的实用课程,因此在高校教学中的比例被不断压缩。涵盖通识教育的课程所占比例,从 1914 年的 55%,降到了 1993 年的 33%;必修课的平均节数,从 1914 年的 9.9 节,降到了 1993 年的 2.2 节。^④ 为了吸引更多学生学习,以便获得更大利益,私立营利性院校广泛开设大量的“即学即用”的商业课程,非营利性院校也在不断跟进,远程教育则成为群体跟进的方略。“的确,一个人可以通过网络课程从杜克大学取得工商业管理硕士学位,而不需要依靠那些增加花销的校园服务和设施,但它实际上使学生花的钱比他们去杜克大学亲自上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还要多。著名大学已经找到一个取得专业学位的划算方法,提供‘品牌’力量是相对廉价的,同时意味着索取高额的学费——这成为大学的摇钱树。”^⑤为了索取高额学费,大量利用远程教育,不惜牺牲培养质量和学术声誉,这些都是典型的学术资本主义。在网络课程中,会表演、会包装的教授通常最受欢迎,实际内容的传授有时反而成为次要,这种可供一些教授名利双收机会的安排,很可能会影响学校正常授课。为金钱利益而牺牲本职工作中的课堂质量,必然会引起同事心理不平衡,教学风气也就必然随之浮躁。如此往复,最终将没有赢家。

(4) 热衷商业运动竞赛

大学之间的校际运动比赛,本意应是培养人才的校外延展,目的在于减轻学生学习压力,强健学生身体素质,增强学生集体荣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养成校际之间学生友谊。受经济利益的影响,大学校际运动比赛在美国早已发生变异。为培养一支威名远扬的常胜军,大学不得不聘请身价不菲的教练。2001 年的调查显示,美国约有 30 位美式足球与篮球教练的年薪超过一百万美元,是多数大学校长年薪的好几倍。为吸引优秀运动员,大学往往不顾成绩,降格以求,譬如宾州州立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美式足球与篮球队新生的 SAT 平均分数,比同年度入学新生的平均分低了 237 分,杜克大学与斯坦福大学的篮球队新生与普通新生的平均分相差 307 分,美式足球队新生与普通新生的平均分相差 292 分。这些靠低分录取的运动员毕业率明显偏低,1990 年调查显示,在一级战区的大学中,只

^①[美]埃里克·古尔德:《公司文化中的大学》,第 41—42 页。

^②[美]凯文·金赛:《私立营利性大学的师资:凤凰城大学算是新模式吗?》,菲利普·G.阿尔特巴赫等:《私立高等教育:全球革命》,第 199—201 页。

^③[美]约翰·塞林:《美国高等教育史》,孙益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52—353 页。

^④Altbach, P., R. Berdahl & P. Gumpert 等:《21 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杨耕等主审,第 428 页。

^⑤[美]约翰·塞林:《美国高等教育史》,第 333—337 页。

有34%的篮球运动员和48%的美式足球运动员能在六年内顺利取得学位。^① 在学生运动员的培养过程中,大学官员帮助学生调换年级、考试作弊,甚至涂改成绩单等行为也时有发生。大学为获取经济利益,不惜牺牲学生个人成长,这与大学的办学宗旨明显背道而驰。

2. 发展科学的商品化

19世纪德国大学对美国研究型大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追求纯粹知识的探究,一直深受大学推崇。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高深知识的概念发生显著改变。尽管教师仍然希望自己的研究会造福人类,却开始谈永不赔钱的研究。衡量教师的成绩,不再限于出版发表,而是包含了因市场活动而获得的成功。^② 但是,大学教师之所以能够参与市场,仅仅是因为他以前受到的政府提供的教育和训练。企业之所以出资赞助,也是因为这些教师曾经在政府资助下获得过成功先例。^③ 换句话说,教师拿到市场进行转化的研究成果,有较大一部分是在公共教育资金的支持下完成的。因此,教师在成果转化中,应当承担必要的社会义务和责任。然而,在现实中,或出于自愿或被迫执行,这些社会义务和责任往往被抛弃。为了争取各自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大学、企业、教师之间处处设防。当出现利益冲突时,研究人员时常并不根据专业判断,而是根据利益驱使做出妥协或让步,甚至做出见利忘义之举。^④ 科学研究已经失去了以学术为志业的道德高度,也失去了追求真理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学术资本主义在发展科学中,还表现为学术声望的商业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大学建立(或破坏)学术声望、社会声誉和影响力的基础在逐渐而持续地转移。过去是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同行评价而逐渐积累起来的,20世纪上半叶是通过杂志社或出版社而产生的学术论文和著作逐渐积累起来的,70年代以后,大众传媒成为学术声望、社会声誉和影响力的主要推手。公众的注意力都强调“物以稀为贵”,媒体没有充裕的时间来培育一个人的声望,不可能眷顾那些曾带来学术声望的勤勉品质,更不可能等待学者们坚忍不拔、锲而不舍地探求真理与正义。得到媒体瞬间炒作的学者,其命运与运动员、流行明星、彩票赢家,甚至恐怖分子、抢劫犯相差无几。^⑤ 学术声望所根植的学术品质,在商业媒体的反复炒作下荡然无存。基于高深学问的学术声望,在大众传媒的品头论足下,冲去了学术的寂寞与孤独,只剩下对金钱和世俗名声的欲望,最终学术声望也随之而失。

3. 服务社会的商品化

以康奈尔理念和威斯康星思想为标志,美国大学在19世纪中后期就形成了服务社会的职能。经过百余年的历史演变,这一职能从广度和深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学不再是单纯为开设足够的课程而努力,而是通过研究服务社会;大学不再单纯满足于服务本地区,还将触角延伸到其他各州甚至海外,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获取外部利益的动机之上。由此,技术科学不但在大学内部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在大学外部占据绝对市场份额。斯劳特和莱斯利认为,大学越来越把计算机、电信、电子、先进材料、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视为全球竞争的核心。技术科学使科学和技术、发现和革新的分离成为可能。技术科学既是科学又是产品,它瓦解了知识和商品的区别,使知识成为商品。^⑥ 知识可以成为商品,但知识绝对不能与商品没有边界。一旦知识与商品没有了边界,知识的公益性也就荡然无存。

事实上,大学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其营利活动越来越侵蚀了非营利性大学的本质。正是基于这种担心,大学的营利活动曾先后受到市政当局、企业主,甚至税务署的详细检查,监督校园活动以

^①刘兆汉:《序:平衡利益与学术》,[美]德瑞克·伯克:《大学何价:高等教育商业化?》,杨振富译,第61—68页。

^②[美]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学术资本主义》,第19页。

^③Slaughter, S. & G. Rhoades, *Academic Capitalism and the New Economy: Markets, State, and Higher Education*, pp. 4—5.

^④[美]德瑞克·伯克:《大学何价:高等教育商业化?》,第92—95页。

^⑤[英]安东尼·史密斯、弗兰克·韦伯斯特:《后现代大学来临?》,侯定凯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39页。

^⑥[美]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学术资本主义》,第34页。

确保它们符合机构在教育事业方面的非营利性地位。在其他企业看来,如果一所大学拥有旅行社和电脑销售中心,那么它与私立商业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区别对待?在财产税当局看来,一个大学的体育场经常被用来举办摇滚音乐会,为什么将其作为教育类设施而被豁免税收?于是,纽约开始向锡拉丘茨大学的凯利圆顶室内运动场征税,印第安纳大学的高尔夫课也要向当地交纳财产税。^①当大学从事服务社会的手段摆脱了高深知识的公益性,当大学服务社会的目的仅限于赚钱,传统大学所应该享受的诸如免税权力,就必然会遭到质疑甚至剥夺。

(三) 大学管理的公司化

自殖民地学院以来,美国大学教师在管理方面就一直享有较大权力,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底部沉重的制度架构,一直为高等教育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受到严重冲击。诸多研究表明,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里,决策越来越集中于董事会和校长,只有选择性的公开话题才广泛征求意见。由于资金紧缺,在美国大学产生了一种新的竞争行为和理念,诸如“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ning)、“标杆管理”(benchmarking)、“外包”(outsourcing)、“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业务流程重组”(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等,都是直接从企业借鉴而来。每一个词汇都意味着首先是衡量投入和产出,然后通过内部资源竞争来提高效率。当面临资源萎缩,政府拨款日益减少时,大学便将预算负担转移到学生身上,学费数额不断攀升,这无疑加速了高等教育的私立化。^②借鉴企业的管理方案和技术,以投入和产出为导向,从近期来看可能会提高效率,但是从长远来看,有可能会丧失大学最为宝贵的部分。以大学事务外包为例,在某些情况下是成功的,如将书店或餐饮服务进行外包;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结果则是灾难性的,如将宿舍或与教育教学活动密切相关的设施进行外包。^③无论是外包学生宿舍,还是外包教室、实验室等,都无疑会损害大学培养人才的核心目标。

大学商业化管理趋势在美国公立大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传统上,美国公立大学有联邦政府拨款,州政府也为其注入大量资金。但是伴随财政拨款的持续下降,大学的管理模式也随之发生变革。1960年,州政府对密歇根大学的普通资金投入是70%,2000年时下降到36%,而且还在持续下降。除了在访问州首府兰辛期间,校长杜德斯塔特(J. J. Duestadt)平时并不把密歇根大学描述成一所州立大学,在他看来,大学曾经受到州政府资助,然后是受到州政府帮助,目前只能说是坐落在这个州而已。无论人们喜欢与否,学校变成了杜德斯塔特所说的“密歇根大学有限公司”,它被当作一个商业企业在经营,被比作《财富》上的500强。对于弗吉尼亚大学来说,情况同样如此,州政府总是试图为大学提供小部分收入,却想得到它100%的控制权。由于经济拮据,许多有才能的教授去了其他地方。校长不得不对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能提供更好的资助,他们不得不使大学的部分私有化。2003年,弗吉尼亚大学的法学院和商学院相继成为自给自足的私立学院,在与大学反复讨价还价之后,商学院按照10%收入上交学校。受此影响,古典学系、文理学院乃至图书馆都纷纷卷入私有化浪潮,进而使弗吉尼亚大学更加接近于一家控股公司。^④无论是“密歇根大学有限公司”,还是“弗吉尼亚大学控股公司”,都预示着美国公立大学深受商业影响,学术资本主义已经渗透到大学运营的机体。

^①[美]约翰·塞林:《美国高等教育史》,第328—330页。

^②Hanley, L., “Academic capitalism in the new university”, *The Radical Teacher*, Vol. 73, 2005, pp. 3—7.

^③Kezar, A., “Obtaining integrity?: Reviewing and examining the charter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ety”.

^④[美]大卫·科伯:《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晓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1—154页。

四、展望：回归学术、超越主义与责任担当

从历史上看，从学术资本演变为学术资本主义，并非当下高等教育的独特现象。尽管学术资本主义是一个当代词汇，但是它所表达的趋利取向，与中世纪大学后期的学术商业化别无二致。从现实来看，虽然学术资本主义最早产生于美国，但已经遍布世界。学术作为资本，要想成为天下福祉之公器、大学竞争之资源、国家强盛之根基，就应当回归学术，超越主义。当然，高等教育不是商业，大学组织也不是公司，规避从学术资本到学术资本主义的演变，需要国家、高校、教师等多方共同的责任担当。

（一）回归学术

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伯克(Derek Bok)所说，我们绝对不能根据市场的需求，设计大学课程或决定研究计划。有些科学问题虽然没有可预见的市场价值，还是值得研究；在某些专业领域，如埃及古物学或知识论(epistemology)，即便很少有人会对这类知识有兴趣，它们仍旧值得一流的学术研究，像俄罗斯文学或伦理学，虽然许多学生不懂得欣赏，也无法藉此找到工作，但它们都是大学课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① 大学一词虽然源自于中世纪行会，但也蕴含着知识的整体性。因此，大学绝不能因为有的知识商业价值较大而趋之若鹜，也不能因为有的知识暂时不具备商业价值而弃之不顾。知识除了商业价值，还有更加可贵的文化价值，正是因其文化价值，人类才能够不断走向文明。另外，此时看似不具备商业价值的知识，不见得永远不具备商业价值，等到人类认识到知识的经济价值时，再回头寻找，会发现它们已经成为无人能识的“绝学”。因此，回归学术是大学充分发挥其职能的应有之义，唯有坚持学术，大学才能够真正履行好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的职能。倡导回归学术，就是要倡导回归一种超越名利的学术，一种求真求善的学术，一种走向文明的学术。

（二）超越主义

社会上任何一个组织，都会根据其不同性质而拥有一个最为主要的资本形式，强调主要资本形式，就是要强调任何一个组织都不能忘记本真，否则必然会引起组织的变异。多样资本之间是这样，同一资本发生变异也是如此，从学术资本到学术资本主义就是学术资本的典型变异。事实上，在中文语境中，许多中性甚至褒义的概念，如果加上“主义”，概念内涵就会发生质的改变，譬如理想与理想主义，经验与经验主义，等等。学术资本与学术资本主义的边界主要在于趋利取向，前者是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后者是依靠学术唯利是图。因此，知识的商业化是学术资本发展成为学术资本主义的重要渠道。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个在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中唯利是图的大学，迟早会被淘汰。因此，无论是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还是服务社会，如果不走出商业化阴影，就不可能走出学术资本主义的泥潭。那么如何规避学术资本主义？伯克认为，“最明显的办法是，在决策之前，先仔细衡量每个商业机会带来的利益与负面影响。它可以为学校增加多少收入？要承担哪些风险？会造成哪些损失？这些损失会超过具体的既得利益吗？”^②我们认为，对当下大学而言，回归学术与超越主义应当相伴而行，在张扬学术资本，规避学术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更需要国家、大学和教师共同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①[美]德瑞克·伯克：《大学何价：高等教育商业化？》，第52页。

^②[美]德瑞克·伯克：《大学何价：高等教育商业化？》，第55页。

(三) 责任担当

1. 国家责任

摆脱学术资本主义,不能单纯依靠大学和教师,这就像给人体去除内部毒瘤,不能仅依靠病人自己一样。国家应当出台明确的制度安排,给学术资本到学术资本主义的变异划出红线。一旦学术资本在转换中突破了红线,就应当受到制度约束。美国营利性高校的出现,无疑是得到了政府认可。营利性高校已经丢掉了大学的灵魂。菲利普·阿尔特巴赫认为,政府就不应准许它们提供学术性学位。^①然而,美国政府不但赋予它们大学的名号,还允许其授予学士、硕士,甚至是博士学位。更为重要的是,在修订佩尔助学金以后,政府赋予其享有与非营利性大学同等地位,无疑为学术资本主义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伴随知识经济的发展,大学在国家核心竞争力中的作用不断加强,政府有义务为大学发展提供必要的公共资金,以确保高深知识的公益性。从历史发展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大学的崛起,都是与政府强力支持密切相连,无论是19世纪德国大学,还是20世纪美国大学,均概莫能外。

2. 高校责任

第一,大学活动不是商业。如果学校领导者们个个都表现得都像个钱串子,他们还怎么去守护滋养精神创造的自由条件?如果大学研究机构全都沦为赢利的产业,亚里士多德所讲的静观的快乐又在哪里?如果公立的学术机构竟然只关心牟利问题,纳税人的血汗钱又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大学已变成唯利是图,超越和对抗功利的博雅艺术与人文科学又将何以容身?如果学生已经变成必须争取和讨好的顾客,校园里的风气将败落到何处算是一站?如果不能赶在孩子们成长之前铸就他们的心灵,整个国家的未来还能有什么指望?如果任何不在乎金钱只计较真理的思想机构都已不复存在,人的精神视野中到底还剩下了什么?^②这一连串的灵魂拷问,都应当使大学时刻保持警惕,在做出每一个行动时,反思这些追问,并进而做出符合大学精神的制度安排,大学才能够远离学术资本主义的侵蚀。

第二,大学组织不是公司。大学治理要根据组织特点,不能盲目引进公司治理。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机构,这意味着大学校园内要远离公司化的标识。假设可口可乐公司与普林斯顿大学接洽,愿意提供2500万美元,换取在该校的拿莎堂(Nassau Hall)入口刻上五个简单的英文字:“Things Go Better With Coke”,普林斯顿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心灵上的麦加,就在于不断在高深知识上求真、求善、求美。大学是社会发展的引擎,同时也应当是社会发展的良心。^③大学不是公司,要求大学始终不能忘记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的根本使命,在政策执行时要充分考虑组织底部沉重的特点,要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在做出决策前要坚守基本的学术原则和底线。

第三,大学应当自立自强。尽管大学不能够以营利为目的,但是大学发展需要经费,而且是不断增长的巨额资金。政府在有限供给的情况下,大学不能不自立自强。如何创办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创业型大学,不但关乎大学能否自治,也会关乎学术能否自由。质言之,大学适当的市场行为不但不会使其坠入学术资本主义的深渊,还能为大学发展注入活力。伯克认为,以往的思维只从防堵的方向去考量,所以问题丛生,若能改变思考方向,从疏导的方案把创新、创投、创业的理念结合在一起,同时从获利中划拨一定比例资金,作为高校研究基金去鼓励创意,就会产生不同效果。^④

^①[美]菲利普·G.阿尔特巴赫:《冒牌大学的兴起》,菲利普·G.阿尔特巴赫等:《私立高等教育:全球革命》,第22页。

^②刘东:《丛书序》,[加拿大]比尔·雷丁斯:《废墟中的大学》,第22页。

^③[美]德瑞克·伯克:《大学何价:高等教育商业化?》,第203—239页。

^④曾志郎:《大学之道:创新、创投、创业、创资?》,载[美]德瑞克·伯克:《大学何价:高等教育商业化?》,第12页。

3. 教师责任

大学教师作为高深知识的传承、创新以及服务的主体,肩负着重要责任。为了防范个人的学术资本主义行为,需要国家和高校做出明确的正式制度制约,但是,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来看,正式制度的实施不但需要巨大成本,而且一般很难全部奏效。因此,从根本上说,教师的自我约束是规避学术资本主义的根本动力。教师之所以为师,除了生存,还需要得到学生和同事的尊敬,丢掉教学天职,无疑自断后路;学者之所以为学,除了生存,还需要得到研究进展的成就感,以及学术同行的认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教师要不断警醒自我,确保不为物欲和偏见所左右。总之,无论是教师还是高校,如果不能回归学术资本,不能超越学术资本主义,那么最终伤害的必然是教师和高校自身。大学兴于学术资本,败于学术资本主义;教师成于学术资本,败于学术资本主义。一定意义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就是在学术资本与学术资本主义相互交替、兴衰起伏中不断演进的历史,世界高等教育的重心,也将伴随这种演进不断发生地域上的转移。

(责任编辑:蒋永华)

From Academic Capital to Academic Capitalism: Focusing on American Universities

HU Qinxiao

Abstract: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the academic capital and academic capitalism have attracted people's close attention.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m is whether the action under their guidance is interest-oriented or not.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ot only have the most abundant academic capital, but also are the source of the academic capitalism theory and the place where academic capitalism is very popular. The external forces such as the politics, market and culture, and the internal subjects such as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ers,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the shift in focus from academic capital to academic capitalism in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change from an academic value orientation to a commercial value orientation is embodied in the commercialization in the idea and function of universities which have been gradually turned into corporation-like institutions. Academic capitalism, as a kind of practice, has been spread worldwide. To avoid academic capitalism, we need to promote the return of and the transcendence over academic capital and make sure that the state, universities and teachers shoulder more responsibilities.

Keywords: academic capital; academic capitalism; interest orientatio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bout the author: HU Qinxiao, PhD in Education,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00).